

# 从辛亥革命看政党素养 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意义<sup>\*</sup>

徐龙建，李 玉

**[关键词]** 辛亥革命；政党素养；民族复兴

**[摘 要]** 衡量一个政党素养较为显著的三个基本元素，即严密的组织体系、坚定的理论信仰与鲜明的政治立场，其外化效应为组织凝聚力、理论创新力和社会生命力。孙中山虽然依托现代政党，发动了辛亥革命，但他缔造或领导的现代政党在政党素养方面却存在着深层的历史局限，从而制约了革命与建设功效，难以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比照辛亥革命伟大艰辛的探索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表现，俾能有力地说明：政党的组织凝聚力是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撑和重要法宝，政党的理论创新力是民族复兴的发展牵引和思想保障，政党的社会生命力是民族复兴的内生动力和胜利密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当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与其卓越的政党素养有着必然的关系。

**[作者简介]** 徐龙建，南京大学—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博士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09）；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是一个有共同政治目标、体现共同政治责任、追求共同政治利益的社会组织。衡量一个政党素养较为显著的三个基本元素，即严密的组织体系、坚定的理论信仰与鲜明的政治立场，其外化效应为组织凝聚力、理论创新力和社会生命力。孙中山依托革命政党，发动辛亥革命，并领导了此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但他缔造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在政党素养方面均存在各自的历史局限，从而制约了革命与建设功效，难以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相形之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sup>②</sup> 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项目号：20ZDA02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红色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路径研究”（项目号：21CK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页。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我革新，致力于提升核心能力与全面素养，确保党的组织凝聚力、理论创新力、社会生命力超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从而使其能够继承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前驱的遗愿，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探索凸显政党素养具有重要价值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现代政党领导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这个政党在多数学者的论述中一般被称为“革命党”，说明其成分多元，结构复杂。这个政党可追溯至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与此后相继创立的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现代政党，对于发动、领导辛亥革命发挥了重要影响与关键作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同盟会由秘密状态变为进行参政、议政的公开政党；民国元年又合并其他数党改组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教训、检验原国民党员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建党和建国思想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基本理论，都是在同盟会时代就开始奠立，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同盟会“即今日国民党之元祖也”<sup>①</sup>。也就是说，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作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有着明显的传承，其实这是一个现代革命政党的流变形态。这个现代革命政党的立党之基就是辛亥革命。

武昌首义虽然是各派革命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同盟会的发动与领导无疑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武昌起义胜利之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同盟会员的自信心受到极大激发。12月24日，中国同盟会本部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宣言，表示愿“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返抵上海，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共到17省代表，孙中山以16票当选，另一票为黄兴<sup>②</sup>。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是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议的各部总次长名单：虽然孙中山主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用人方面，“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sup>③</sup>。但在总计18名人员中，同盟会会员占有12席。各部部长虽多由旧官僚充任，但负实际责任的各部次长均为同盟会会员，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不啻一个同盟会政府。同时，临时参议院议员亦以同盟会占大多数。由此说明，同盟会作为一个政党，赢得了一时的成功，奠定了历史的功勋，辛亥鼎革之际各方政治力量普遍“尊重同盟会之系统，并承认辛亥革命完全为同盟会主动”<sup>④</sup>。

但历史并未沿着同盟会预想的道路发展。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临时政府北迁，同盟会联合其他五党改组国民党，号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sup>⑤</sup>。这个当时中国“最占优势之党”，企图通过议会政治，将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加以巩固，并推向深入。但袁世凯集团缺乏政治诚意，不讲政治规则，唯利是图，肆意妄为，善后大借款，暗杀宋教仁，国民党虽然不得不兴兵讨袁，但匝月而败。孙中山、黄兴、张继、陈炯明等相继逃往日本与南洋，袁世凯先是解散国民党，迫害议员，继则解散议会，竟至复辟称帝，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被毁坏殆尽。

孙中山“忧愤交集，不忍见二十余年艰难缔造之革命主义未达，遽尔不振，乃亲率能立于战场之

① 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印行，1926年，第11页。

② 谭人凤：《石叻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④ 罗福惠等主编：《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⑤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19页。

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sup>①</sup>。该党与国内的革命力量共同参与讨袁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撤销帝制，但继掌政权的北洋军阀耽于私利，罔顾公义，虽然打着“共和”旗号，但并无“民主”的气象，将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擘画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弃如敝屣，将约法文本视同废纸，孙中山愤起领导“护法运动”。但是，孙中山虽然得到民国海军和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却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第一期护法运动失败。这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sup>②</sup>。现实也促使孙中山对建国策略进行反思。对策就是立即启动党的改组工作，重组强有力的革命党，重新动员与聚集革命力量，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奋斗目标。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虽然沿用了“国民党”名称，则又加上“中国”二字，以示新党不同于民国国民党<sup>③</sup>。从兴中会开始，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护国战争，孙中山先后领导创建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领导了数十次武装斗争，经历了从“革命家”“执政者”“建设者”，再到“革命家”的多重角色转换，提出了诸多政治理论与国家建设方案，但他直到晚年仍然感叹不仅国家未能“振兴”，而且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不过，世界的革命环境与中国的革命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sup>④</sup>此后，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势发生极大改变，中国共产党也逐步成为辛亥革命政治遗产的实际承受者，成为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际践行者，并最终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绘就自辛亥革命以来民族复兴的强国蓝图的重要使命。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尽管“愈挫愈奋”，但最终留下的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领导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而且“富起来”、“强起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原因固然包括许多方面，但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不难发现政党素养在领导革命与建设、实现民族振兴征程中具有关键意义与重要影响。

## 二、政党的组织凝聚力是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撑和重要法宝

以组织凝聚力而言，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及其后续革命政党显然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中国同盟会虽然颁布了革命纲领，制定了组织规章，成立过各级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党的完整形态，这也与革命环境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同盟会在国内虽然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但其基层组织的重心在海外，在国内则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同盟会未能建立起近代政党必要的通讯（沟通）机制，组织联系十分薄弱。

许多人所谓是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指他们历史上曾履行手续，参加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sup>⑤</sup>。四川学者通过对区域史的研究指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之间的联系很薄弱，信息不通。同盟会在组织上也十分松懈，没有形成一个全川性的强有力的领导核

①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9、28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71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⑤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心”<sup>①</sup>。还有学者在剖析贵州同盟会组织时也指出：“松散正是整个中国同盟会组织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1907年和1908年以后，整个中国同盟会都几乎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同盟会对于各地起义的领导，一般都是通过其基层组织或会员个人，以分散的、单独的革命活动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贵州只不过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为典型罢了”<sup>②</sup>。一位同盟会骨干成员以其亲身经历也证实了同盟会组织的极端松散性，他这样回忆：“事实上同盟会却采取听凭会员个别就地单干的方式，同在一地的会员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偶有个别例外情况，却是因为双方本来就是帮会弟兄，是原来帮会的联系，而不是同盟会的组织关系。象我们这样与帮会无缘的，就成为孤孤单单的游离分子，同时和同盟会总部也不通声气”<sup>③</sup>。这恐怕也是当时国内同盟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状况。胡汉民在总结革命年代同盟会建设状况时，就毫无隐晦地说道：同盟会“组织实非完善，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领导”<sup>④</sup>。寥寥数语，道出了当时同盟会组织结构的根本特征。组织方面的极度涣散，使同盟会丧失部分政党特性与职能。甚至有人不认为同盟会是一个政党<sup>⑤</sup>。

辛亥革命之后由中国同盟会与其他五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虽然势力强大，但散漫更甚，正如邹鲁所言，同盟会合并他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官僚政客以及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使该党“体质既为变化”，革命性大为消退。孙中山本人也认为讨袁之役，“追其失败之原因，乃吾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sup>⑥</sup>。正是基于清洁革命队伍之考量，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以加强政治的组织凝聚力。该党在护国战争中虽然不无出色表现，但护国之役结束，该党失去“革命”对象，党务长期处于废弛状态，仅在上海保留总部，直到孙中山在1919年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此后，孙中山在苏俄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整党务，加强组织建设，才使该党的组织一体化程度大为提升。

相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发起，就是以“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为目标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包含了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对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结构、工作制度和党的纪律等作了初步的规定。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和明确的规定，为贯彻实施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值得说明的是，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份决议案里就特别强调了纪律、集中的重要性，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sup>⑦</sup>，并明确提出具体要求：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和铁的纪律。据此，决议案里还提出了诸多依据原则，如“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sup>⑧</sup> 这些论述和规定，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为建设一个有强大组织凝聚力、动员力和向心力的坚强无产阶级政党打下良好基础。

党在工作中坚持实行严格的纪律，对违犯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和党成立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历来强调，全党

① 魏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2页。

② 刘毅翔：《略论自治学社与同盟会贵州分会》，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③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④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53年，第63-64页。

⑤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28页。

⑦⑧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页。

必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sup>①</sup> 坚定的理想信念加上严密的组织体系，再加上严明的纪律规矩，使得党像一台结构复杂的精密机器，紧密、协调、高效运转，产生强大力量。党的二大以后，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人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期间，全国举行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有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有了新的进展，广东陆海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便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

党的组织凝聚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还在于党高度重视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以战胜强大敌人。党的二大闭幕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按照既定的革命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各方面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中共中央首先致力于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抗日战争时期，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军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赢得战争胜利。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和进入新时代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最广泛的聚合起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共识，吸引了最广大的社会先进分子，为民族复兴大业汇聚了各方力量。

### 三、政党的理论创新力是民族复兴的发展牵引和思想保障

一个政党首先是政治理念的共同体，对于革命政党而言，政治理念的共同体依托于理想信仰共同体的建设，而理想信仰共同体的构筑离不开理论上的彻底和清醒。党的理论的集中体现首先表现在党纲、党义所宣示的该党的价值导向、行动纲领、近期目标与远期理想上，这对于引领党员的思想与行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党内对于党纲、党义的领会、认同与贯彻程度，也是该党政治认同度的重要反映。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与该党的理想信仰共同体建设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党高举反清革命旗帜，赢得普遍的社会支持，从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恢复中华”大致是晚清各阶层民众程度不同的“革命”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同盟会带头宣示，因而能够聚集较大的社会能量。但是，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恢复中华”目标的“实现”，中国同盟会失去了革命的对象，如同退潮时的大堤，没有外部压力后，内部容易崩坍。从执掌政权到让出政权，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一度出现理论混乱与信仰真空。国民党一成立就“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sup>②</sup>；“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sup>③</sup>。邹鲁说：国民党“职员几竟多至千数，此犹在初成立时言之。其后陆续添加，凡国会议员、内阁人员、各省代表、各省长官，凡挂名党籍者，无不在干事之列”；“甚至赵秉钧内阁除海陆军总长外，咸挂名国民党，时有号为国民党内阁者”，由此自然造成了国民党本部“鱼龙杂处，真伪不分”的“大弊”<sup>④</sup>。宋教仁等醉心于议会政治，专务于国会选举，终被暗杀，国民党的实用政治遭到当头一棒，不得不起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1页。

②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③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8页。

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42、144页。

而“复仇”，终因缺乏“堂堂之阵”而失败。

创建中华革命党之时，孙中山非常注意党员信仰问题，制定了宣誓效忠党魁并加盖指模等入党程序，以期强化党内意识形成的统一性。他尤其对于党员“盖指模”之举非常重视，认为通过此举，可以达到“昭信誓”“验诚实”“重牺牲”“明团结”的作用<sup>①</sup>。在孙中山看来，革命从信仰主义转变信仰党魁，他甚至将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叫做孙文革命”，比作“道统”，非常严肃地告诫党员“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sup>②</sup>这种近乎“专制”的党内意识形态培养，并未给该党带来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认同，反而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柏文蔚、陈炯明等人于1914年8月另立“欧事研究会”，另辟政治发展之路。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政体第一次在中国建立，同盟会追求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三民主义剩下“一民主义”，同盟会的政治信仰受到新的政治形势的挑战。一方面，以往既存的一些理念分歧与利益冲突进一步暴露；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党员的价值趋向与利益追求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党员的“心有旁骛”或“移情别恋”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中华革命党时期，三民主义又变成“二民主义”，即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但“民权主义”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又失去了目标，而民生主义则因为中华革命党依旧在野，不属于执政党，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当孙中山后来发现段祺瑞等北洋军阀虽然表现遵奉民主共和之制，实则施行专制集权之政时，再次打出“民权主义”旗帜，号召新的革命。

可见，理论信仰是政党信仰的基石，是指导政党行动的方针，而从同盟会开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在理论认知的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同步与不一致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孙中山晚年也深刻认识到了，正如他所说：“我们造一个党，是因为要把我们的主义和目的贯彻到底。当初创造同盟会，我也就抱着三民主义”<sup>③</sup>，但是，“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拼命去做；至于民权、民生两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sup>④</sup>。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后，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加入该党政纲，其理论建树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反观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⑤</sup>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深厚的历史支撑，从灵魂深处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公布的研究成果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8名党员。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也都有着较为光鲜的职业，成立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迫于生计，或是带有其他复杂动机。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甚至时刻面临着被抓被杀的危险。然而，他们毅然成立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理想信念的毫不动摇。正如习近平所言：“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sup>⑥</sup>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的集中表达，从根

① 罗福惠等：《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

②③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93-394、390、392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素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历史源头，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征程中形成了内涵不同的精神形态，构成了深厚博大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和塑造，充分彰显了党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人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过、放弃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sup>①</sup>

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理论探索史。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断取得胜利。不但建立了社会主义，而且维护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发展牵引和思想保障。

#### 四、政党的社会生命力是民族复兴的内生动力和胜利密码

一个政党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决定着该党社会生命力的强弱。政党的人民性应该是其政治素养、社会素养的重要指标。从同盟会建立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的革命历程及其成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同盟会在秘密状态下发动各地反清起义及武装斗争，虽然在“鼓舞革命”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革命党人并未深入广大民众，更不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同盟会本盟在东京，孙中山又长期游离于本部之外，同盟会上层矛盾不断，多次发生风潮，使孙中山倍感气愤，一度怒称不做同盟会的“总理”。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等人之所以对孙中山多有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孙中山侧重于在边陲地区从事冒进式的武装暴动，不注意发动群众有较大关系。章太炎就向黄兴说道，同盟会的“言论鼓舞”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边陲零星起义“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他建议“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数府，然后四方响应，藉群力以仆之。”<sup>②</sup>“藉群力以仆”，也并不能证实同盟会领导人意识到民众动员的重要意义，只是说明同盟会在革命引爆点与引爆方式上有所调整。同盟会未能意识到民众动员的意义，也未能找到发动民众的有效途径，其影响力主要集中于青年知识阶层，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反清会党与清政府新军。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封建帝制虽然结束，民主共和政府建立了，但对于民众而言，也只是“皇帝没了”，并未能从思想深处和现实利益方面感受到辛亥革命带来的好处，甚至因为自身生活与处境未能改善，而兴“民国不如大清”之叹。

由于没有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关系，同盟会的“革命党”形象，使其辛亥革命之后反而遭到民众疑忌，正如同盟会元老之一的张继所言：“当革命初起，革命党人人欢迎……世局渐定，则党革命党为害，此殆公例不可逃”<sup>③</sup>。自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以及各种“毁党”之说，均为不利于同盟会的政治气候，也是该党缺乏民众基础带来的结果。同盟会联合其他五党改组为新党时，取名“国民”，且将党的宗旨确定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似乎有重视民众的意图；孙中山着重指出：“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sup>④</sup>。但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仍然较为疏离，除了宋教仁等到各地拉选票之外，未见国民党与“国民”更多的互动，以及更为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当务之急在忙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②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08页。

于议会政争，即“巩固共和”。但姑且不论袁世凯的有意破坏，使民主共和制度推展受阻，即使倒袁之后，议会重开，民主共和政制在形式上有所恢复，老百姓也未感到从中受益。说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在当时走得都是“上层路线”，与民众存在一定的距离。护国战争之后，孙中山本人政治选择是重政轻党，中华革命党本身也被长期搁置，遑论党群关系的改善了。

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一方面意识到了民众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此前重政轻党的革命策略屡受挫折，乃重新整顿党务，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对于“国民”的力量再次给予重视。中国国民党的党群关系才有了一个新变化。

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sup>①</sup>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当时的中国各种救亡图存的策略方案众说纷纭，轮番登场，但始终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国运的日渐衰微。1917年，“世界新文明之曙光”的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比较和郑重考量毅然选择了俄国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中共一大纲领中鲜明地指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sup>②</sup>。1922年，集中共早期领导人理论探索之大成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点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sup>③</sup> “社会革命”和“先锋队”的阐发，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和自我追求。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成立之初便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党的二大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sup>④</sup>。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合，映照出使命型政党初心使命的精神本源，体现出党的政治素养的崇高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sup>⑤</sup>。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党的社会生命力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鲜明的政治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社会生命力。中国人民一旦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曾改变过。把人民装在心里，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作决策、定政策的最高标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党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也从人民中获得了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用理念主张更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的社会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前进动力。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及其后续革命政党与中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③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133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0页。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比照，深刻启示我们，政党素养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和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党素养的培育与塑造，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不断增强组织凝聚力、提升理论创新力、保持社会生命力，确保党的核心能力与全面素养超越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sup>①</sup>。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志向和远大追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也是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的充满中国智慧的伟大贡献。努力建设世界最强大政党，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本身也是一个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素养的鲜明标识。我们要葆有“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勇于自我革命。通过自我净化，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通过自我完善，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通过自我革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开辟未来；通过自我提高，厚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树立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和政绩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sup>②</sup>，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志向远大、格局宏大、影响巨大、事业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优良的素养将使其能够最广泛地凝聚起党心民心军心，最大程度地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李文苓]

##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y Literac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Xu Longjian<sup>1</sup>, Li Yu<sup>2</sup>

(1. Yuhuatai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9, China;

2.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arty literac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bstract] The three basic elements that measure a party's literacy are a strict organizational system, a firm theoretical belief and a clear political position, and its externalizing effects are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vitality. Although Sun Yat-sen launche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relying on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parties he created or led had deep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party literacy, which has little effect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mparing the great and arduous exploration of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can be effectively explain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a powerful support and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the development traction and ideological guarante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social vitality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success cod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reason why the CPC can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lead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evitably relates to its high level of party literacy.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 第17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人民出版社, 2021年, 第33页。